

批“资”实录

中共沧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总结历史经验 坚定必胜信念

中共沧州地委书记 郭枢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成人民富裕、幸福，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夙愿，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我们党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基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先革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是我们的革命阶段论、发展论。我党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之奋斗牺牲了，他们没有看到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我们活着的同志想起他们来就难

过。然而这也激励着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建国以后，我党领导人民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做了极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包括一些反面的经验——教训，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花了学费。在这样一个人多、经济落后、底子薄、贫穷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只能是探索，自己创路子。因此，不能一切顺利。不可能不走弯路，不可能没有失误。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确的经验对人类是财富，反面的经验甚至严重的教训，只要我们汲取了同样是财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批“资”实录》应起到这个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正在于使我们今人和后人能够更聪明些。

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正所谓“物极必反”。建国以后，“左”的路线推行了二十多年，“文化大革命”是它的顶峰。由于“左”，而造成了乱。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

“左”的路线和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志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全面推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惠及全国人民，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十年改革使生产力大解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富裕。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生产力的标准，这就还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是一条马列主义与中国改革、建设实践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路线。

灾难和不幸已成为过去。展望未来，前程似锦。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沿着十三大的路线，深化改革，建设四个现代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奋进。在革命、改革的路上难免有失误、挫折和失败，但终归要胜利，要成功。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我们应当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经过我们今后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在经济上一定会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政治上造就比他们更切实的民主，造就更多的优秀人才。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她的经济及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一定会显示和发挥出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应该坚定这个信念。

1988年12月7日

序 言

中共沧州地委副书记 张志欣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今天“文革”早已作古，但这场浩劫留给人们的教训无论在当代还是将来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地委党史委根据上级关于征编建国后党史资料的指示，结合我区情况，编印的《批“资”实录》这本书，本着录实存真的原则，选入了22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革”中在农村开展的所谓“批资本主义倾向”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文革”中，沧州和全国一样，一次又一次掀起大批“资本主义”、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潮，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人们的思想留下了很深的创伤，这本书的作者，客观地记录了批“资”、割“尾巴”的“理论”、内容、方法、危害，再现了这场运动在农村造成的劫难。

批“资”、割“尾巴”，从根本上说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四人帮”用来打人的一根棍子，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的教训又是多方面的，比如：违背客观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等），胡作非为，瞎折腾；违背人民意愿，不听群众怨声，不管农民疾苦，强行硬施，乱砍杀；混淆两类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压制人民；不从实际出发，不作具体分析，绝对化，一刀切；等等。读一读这本书，对于我们牢记“文革”教训，清除“左”的影响，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搞好改革和四化建设，都是大有裨益的。

地委党史委编纂“文革”中的史料还是第一次，由于理论、政策水平所限，不妥之处难以避免，希望大家读后提出意见。

1988年12月13日

目 录

总结历史经验 坚定必胜信念

..... 中共沧州地委书记 郭枢俭 (1)

序言..... 中共沧州地委副书记 张志欣 (5)

沧州地区批判“资本主义”的情况

..... 戴晓农 李福治 (1)

大批“资本主义”批了些什么..... 杨凤岗 (17)

献县大批“资本主义”的几种做法

..... 中共献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26)

批“资”掀风浪 群众吃苦头..... 王建西 (29)

黄骅县大批“资本主义”的做法

..... 中共黄骅县委党史办公室 (35)

河间县批“资”数例

..... 中共河间县委党史办公室 (41)

毁苗拔根现场会记实..... 曹春龙 李树生 (46)

于庄庭院种菜的兴衰

..... 中共献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50)

如此“整顿”副业

..... 中共泊头市委党史办公室 (53)

砍向社队企业的两刀

- 宁中秋 王彦伦 李文欣 (58) ▶
- 批“资”对社队工副业的冲击..... 孙文强 (65) ▶
- 宣庄大队副业的兴衰与得失..... 刘玉梅 (72) ▶
- 批“资”批“洋”教训沉痛..... 杨增国 (76) ▶
- 扒砖窑的风波..... 中共肃宁县委党史办公室 (79) ▶
- 吴桥县大批“资本主义”两例
..... 李芳明 卢玉朴 (83) ▶
- 紫塔东村大批“资本主义”的情况
..... 中共献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89) ▶
- 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什么? 马书芝 (92) ▶
- 孟庄搞编织养母猪连遭批判
..... 中共任丘市委党史办公室 (95) ▶
- 姜堤一大队批“劳力外流”事件始末
..... 中共任丘市委党史办公室 (99) ▶
- 民意难违“鸡屁股银行”堵不住
..... 高长森 (101) ▶
- 大批“资本主义”的两个典型案例
..... 寇永文 孙文强 (105) ▶
- 我在大批“资本主义”年代里的一段经历
..... 韩守中口述 刘恒永 牛凤池整理 (111) ▶

沧州地区批判“资本主义”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沧州地区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左”的那一套思想、路线的指导、影响下，曾反复批判过“资本主义”。那时，“四人帮”大施淫威，他们在上头刮起一阵阵风，就吹起下边一层层浪。什么学大寨“大批促大干”，什么“狠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学习继续革命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等等，运动一个接一个，高潮一次连一次。每一个运动，每一次高潮，都要“上批下联”，“上纲上线”，批一顿“资本主义”。而且，从“批资本主义倾向”，到“大批资本主义”，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步步升级，次次严厉。

“资本主义”何其多？其来自何方呢？按当时那套“左”的逻辑是这样认为的：农民是“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就是从农民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是对列宁原意的严

重歪曲。因为我国农民已经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不再是列宁所指的那种“小生产”了，不会再产生大批资本主义了。那么，“文革”中批“资本主义”究竟批了些什么呢？根据当时一些文件的记载和一些同志的回忆，大体可归纳为五个主要方面：

一、批“重副轻农”，砍工副业

在“文革”中，农村的工副业生产，被当作社会主义方向和发展农业生产、大上粮食的对立物，连续遭到“清理整顿”和批判。实际上这种“清理整顿”是严加限制以至取消，是作为“严肃的阶级斗争”来搞的。在清理整顿中，先是开展“革命大批判”，抓“坏典型”，进行“方向、路线教育”，接着对各摊工副业逐项审查，对“黑师傅”（技术员）、“黑业务员”集中办“学习班”，令其检查交代问题。“清理整顿”的结果，有的工副业被迫停产，有的转产，“黑师傅”、“黑业务”予以取缔，甚至有的戴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判刑入狱。沧州地区最早“整顿”工副业，是1969年根据上头指示开始搞的，当时曾受到省的通报表扬。通报中以一个县的一个大队为例，说那里“私设地下工厂，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相当严重”，表扬县里抓住这个典型，发动群众“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击退了资本主义歪风”，并说全县已初步清查“钻入”副业里的“黑技术员”167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从外地流入的坏

人”。从此以后，“整顿”工副业在全区各县陆续开展。1973年4月25日，地区下达了《关于认真整顿农村副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到1973年7月中旬统计，全区“整顿”了2600多摊副业，到年底又“整顿”到4800多摊，并从中清理“黑师傅”、“黑业务”及“坏人”450名。有一个县报告“整顿”副业情况时，提到对163摊“洋副业”停办了49摊，转产了14摊，解雇了32名“黑师傅”、“黑业务”。为什么对“洋副业”全部整掉呢？就是因为这类“洋副业”不是“三就地”（就地取材、加工、销售）的，是“非法”的，是“牟取暴利”的。有的县提出数据说：1—8月份全县副业收入3500多万元，其中这些“非法”的“洋副业”即占60%。那时，工副业收入越多，利润越大，罪过也就越大，因为抓钱就是资本主义。

工副业是如何具体“整顿”的呢？举一些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有个县按上级的要求，举办了一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学习班”，叫来参加的是四部分人：①副业摊子的厂长、会计、业务员；②“搞投机倒把”的人；③外地来的“黑师傅”；④贫下中农代表。“学习班”搞了50天，副业摊子的人，都被迫检查了“金钱挂帅”、“重副轻农”、“不以粮为纲”、“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错误”，最后被罚款，副业被停产，“黑师傅”被驱逐出境。还有个县，由领导带队到一个

公社“整顿”工副业，经过批判，砍掉了一批。群众为了生计，不长时间又恢复起来了。县里发现后，又派工作组到这个公社“复查”，进行第二次“整顿”。这次采取了釜底抽薪、“彻底革命”的办法，要把“黑师傅”、“黑业务”一网打尽，举办了“两黑学习班”，把30多名“两黑”人员集中到一个狭窄的敞棚里，宣布了几条禁令，一天三送饭，门口有民兵把守，不准自由出入。所谓“两黑”，实际上是农村的技术人员和能人，要他们在“学习班”里接受批判，交代问题。有的受不了这种折腾，夜间越墙而逃，跑到东北落了户。其余的“两黑”人员在“认罪”、交清罚款、写了保证书之后，才让回家。办这样的“学习班”，实际是错整了农村的技术人、能人，按群众的话说，是“赶走了财神”。但在当时却认为“通过学习班，解剖典型，开展群众性的路线分析，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端正了农村副业发展的方向路线”。

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工副业经过一次次地“整顿”，砍掉了4500多摊，有3250多名“黑师傅”、“黑业务”被批判、取缔或解雇。“整顿”之后，允许保留的副业，又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比如：果树多的大队一律不准再搞大型副业；大队有副业的，小队不准再搞；投入副业的劳力，农忙时不得超过5%，农闲时不超过10%，大忙停下来；不准再发展翻砂业；生产队不得单

独派人出去联系业务，要由公社统一承揽；副业收入主要用于农业；党支部成员不准去搞副业；等等。这些不合理的规定，限制了副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二、“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闲散地

虽然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但在那时认为这是“迁就农民的觉悟低”，是暂时留给农民的一条“资本主义尾巴”。这就随时都可以割掉。“四清”时批判过自留地，“文化大革命”中，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要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留地，当然就不能逃脱。开始是对自留地种什么作物严加限制，有的只准种点蔬菜自己吃，但不准多种出售赚钱。后来一强调“以粮为纲”，自留地就只准种粮食，而且产量如果高于生产队，又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占了上风”。1973年麦收时，有一个大队1555亩集体耕地，总产11万斤，而295亩自留地则总产10万斤。这就是说，在全队总耕地中，只占16%的自留地的产量，几乎等于占84%的集体耕地的产量。这是说明吃“大锅饭”弊端的一个典型数例，本来应该从中引起反思，吸取教训，而且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也是社会财富，于国于民都有利。但是，那时却被作为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有的还总结了自留地的“十大危害”，诸如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水、争

劳力等“三争”、“五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便规定：社员种自留地要用业余时间或假日，不准占用集体生产的时间；集体的井具、农具、牲畜不准用于自留地；集体的化肥不准往自留地里上；各户积的肥首先要完成交队任务。甚至对社员拾筐粪往哪里背，都要“上纲上线”，进行“路线分析”。往集体地里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往自留地里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由于吃“大锅饭”，也由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断批判“唯生产力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农业生产处于落后状态，农民多亏了有点自留地来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农民称自留地为“保命田”，种的精心，产量高是很自然的。这样在自留地上反映出来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更加明显，更加激烈了。如何加以解决呢？于是将自留地、闲散地收归集体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据1972年7个县的统计，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的大队有的占50%，有的占76%，有的占77%，最多的占94%。1973年，有个县曾向各公社发了一个解决社员自留地与集体经济“五争”问题的通知，列举了自留地、闲散地的几大“罪状”，指出：“这种倾向如不彻底解决，势必直接障碍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发动群众讨论自留地集体经营和

个人经营的两种方法，解决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尽管广大群众思想不通，但自留地、闲散地还是被全部收归集体了。沧州地区收自留地、闲散地问题，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有的说：“就这点生活出路也给堵死了！”有的说：“自留地规定几十年不变，可是有了政策又不按政策办，这不是哄弄人吗？”后来，甚至直接指责收自留地是违反宪法，《人民日报》刊登了《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的报导。

三、批判集市贸易，限制群众赶集

“文化大革命”当中，把商品生产视为“旧社会的痕迹”，必须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这种“左”的思想不断膨胀，就把农村集市视为“资本主义泛滥”最集中的场所，产生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农业学大寨的“严重障碍”。为此，进行了越来越严厉地限制、批判和取缔。1969年和1972年，省里两次下发文件，并代各地区起草《布告》：粮、棉、油市场坚决关死。农村油坊、磨坊、粉坊、豆腐坊，只能代国家、集体和社员加工。连肉、禽、蛋也禁止上市。上市的商品本来卡的就够死的了，但执行起来还层层加码。有的县又规定废旧物资，如木制品、旧鞋、毛织品、棉织品、自行车零件、钟表、丝织品、收音机、草柳编等，都要由商业部门扩大信托业务来解决，不准个人上市交易。社员

自产的蔬菜到集市出售，必须持自产自销证明。作了这么多限制，还让农民赶什么集呢？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限制商品生产，不准商品交换，取消集市贸易。

后来把“加强市场管理”作为“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来抓，于1972年年底在全区搞了一次统一行动，抽调干部职工2120名、民兵9200名、学生1800名，共13120人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主力队伍。全区划分了四个“联防作战区”，在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了520个检查站，对155个集市进行了“大清查”，赶集的群众被驱赶得东奔西跑，有扔下肉车子逃走的，有被追丢了鞋的，有的妇女因为生孩子买了几十个鸡蛋被没收的，有的为过年卖一点玉米，被民兵截住冲了公的，等等，搞得人心慌慌。有一个旧集市，座落在两个县的交界处，自河北规定全省只准在阴历每月逢一、六按指定地点赶集后，这个旧集市属于“取缔”对象。但是，由于在定点的集上群众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买到，所以这个旧集越赶越大。为此引起两县注意，下令禁止，但每逢集日群众还是来赶，不叫在村里赶，便到野外赶，在这个县边界内不叫赶，就到那个县边界内去赶。后来虽经两县联合禁抄，但始终驱赶不散。群众不满地说：“这是赶的什么集？简直是打游击！”

1973年，地区规定，牲畜市场每县只准保持一个，